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
发展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社会主义 和谐文化建设论

王少安 周玉清 ◎ 著

 人民出版社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
发展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社会主义 和谐文化建设论

王少安 周玉清 © 著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论 / 王少安,周玉清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0

(高校社科文库)

ISBN 978-7-01-008849-5

I. 社… II. ①王…②周… III. 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建设—研究—
中国 IV. 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6067 号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论

SHEHUIZHUYI HEXIE WENHUA JIANSHE LUN

王少安 周玉清 著

策划编辑:刘智宏

责任编辑:张旭

封面设计:阳洪燕

出版发行:人民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 编:100706

邮购电话:(010)65250042/65289539

印 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版 次: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73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 张:12

字 数:203 千字

书 号:ISBN 978-7-01-008849-5

定 价:26.00 元

著作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中华传统和谐文化的历史发展	1
第一节 中华传统和谐文化理念的历史演进	1
第二节 中华和谐文化的主要特征	10
第三节 中华和谐文化的历史命运	17
第二章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基本内涵	26
第一节 和谐文化的内涵	26
第二节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内涵	38
第三节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理论基础	43
第三章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现实意义	52
第一节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	52
第二节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地位与作用	59
第三节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重要意义	67
第四章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现状分析	75
第一节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主要成就	75
第二节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84

第三节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91
第五章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理论根本与目标原则	101
第一节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思想理论根本	101
第二节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目标任务	114
第三节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	120
第六章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128
第一节	构建天人和谐文化	128
第二节	构建人际和谐文化	140
第三节	构建自我和谐文化	148
第七章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主要途径	158
第一节	弘扬和谐精神 加强和谐社会制度文化建设	158
第二节	弘扬和谐精神 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	169
第三节	弘扬和谐精神 大力发展和谐文化产业	178
后 记		186

第一章

中华传统和谐文化的历史发展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内容丰富、内涵独特的中华和谐文化。中华和谐文化经历了由史前萌芽、西周奠基、春秋战国成形到后世发展的演进过程,特殊的地理环境、以农业为主的经济背景、家国同构的宗法制度、文化精神的人本取向以及思维的辩证风格等构成了中华传统和谐文化的特殊品质。中华和谐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于和谐状态的美好憧憬与不懈追求,其实现过程艰难曲折。研究中华和谐文化的历史发展,对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追求和谐的精神,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节 中华传统和谐文化理念的历史演进

中华民族传统的和谐文化理念主要表现为“和合”理念或“和”理念,中华民族的和谐文化也可称作“和合文化”或“和文化”。中华和谐文化源远流长,它发端于中华民族的史前时期,奠基于一中国奴隶制文明的鼎盛时期——西周,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并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获得不断的发展。认识中华和谐文化的演进历程,有助于理解其内容的丰富性、内涵的深刻性以及影响的深远性。

一、中华传统和谐文化理念的史前萌芽

中华民族的史前时期一般指的是原始社会阶段,从人猿揖别到传说中的大

禹时代,时间跨度极大。伴随着部落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在同自然的抗争与协调中,中华民族的雏形在史前时期的末端基本建立起来,中华和谐文化也开始逐渐孕育。作为部落融合标志的龙凤图腾,从筑坝堵水到疏川导滞的治水过程,原始共产主义的大同社会与民主风习等,都是中国和谐文化的早期萌芽形式。

龙凤图腾是中华民族早期部落融合的文化标志。图腾崇拜就是将某种动物、植物或者其他存在物视为氏族或部落的象征,是原始氏族或部落的宗教形式,人们相信自己以及自己所属的氏族或部落起源于某一个图腾的代表物。“太皞氏之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①龙图腾、凤图腾出现在新石器时代,二者都不是实际存在的动物,而是多种动物组合而成的综合体,如龙就集中了蛇、鹿、鹰、鳄、马等动物的部分形象,这正是分别信奉上述某个图腾的部落实现融合的标志,也是中华民族早期形成的文化标志。

大禹时代从筑坝堵水到疏川导滞的治水过程,标志着先民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与服从,开始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传在尧舜时代,黄河流域连续发生特大洪水,“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②,人畜葬身鱼腹。夏族首领鲧以“堙障”方法,修筑堤坝以围堵洪水,耗时九年,劳而无功。之后,鲧的儿子禹继续治理洪水,他吸取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利用水往低处流的自然流势,变堵为疏,因势利导,疏川导滞,终于制伏了洪水。禹又率领民众开凿沟渠,引水灌溉,发展农业,化水害为水利,在黄河两岸的平原上开出了许多良田和桑土,成为人民安居乐业的地方。先民治水由堵到疏这一转变过程的历史意义在于,人们在与自然力量的对抗中屡屡碰壁之后,终于深刻地领悟到认识自然、尊重自然、顺从自然的重要价值,大禹治水因此成为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精神的历史源头。

《礼记·礼运》借孔子之口表达了儒家所向往的尧舜禹时代大同社会的和谐图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

① 蒋冀骋点校:《左传》,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322页。

② 陈成国校注:《尚书》,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5页。

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①大道流行,天下为公,讲信修睦,和谐安康,简单淳朴,其乐融融,这是一幅原始共产主义的和谐景象。这一图景虽然不一定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面目,但是,当时原始部落的“众议”与“禅让”却是历史事实,即由参加联盟的各部落首领组成部落联盟会议来决定联盟中的重要事务,在位的部落联盟首领把首领的位置让给公认的有能力的贤人。尧年老时召集部落联盟会议,大家推选了有才德的舜做首领;舜年老时也用同样的方式把部落联盟首领的位置让给了禹。这的确是人类早期的一种民主制度,是原始公有制社会追求和谐的制度保证。

二、中华传统和谐文化理念在西周时期的奠基

西周是中国早期古典文明、原始和谐的辉煌时期。这一时期周公的“敬德保民”思想是社会和谐的理论基础,完备的礼乐制度是实现社会和谐秩序的制度保证,史伯的“和同论”标志着中国文化为寻求和谐秩序而进行哲学探索的开始。

第一,“敬德保民”思想是西周实现社会和谐的政治理论基础。周公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思想,强调道德对于维护统治地位、调节社会关系的重要意义,注重道德教育与道德感化。周公与商朝的统治者一样都相信“天命”,认为统治者是受“天”的委托来治理民众的,周公认为“惟命不于常”^②,即“天命”是会有变化的,统治者必须“以德配天”,“王敬所作,不可不敬德”^③,即君主要对道德存有恭敬之心,努力去培育高尚的道德,要有好的德行。“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④,即如果君主有崇高的道德,上天就会把政权授予他;反之,“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⑤,即如果君主不敬德,上天就要把统治百姓的权利

① 陈戌国点校:《周礼·仪礼·礼记》,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368页。

② 陈戌国校注:《尚书》,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29页。

③ 同上书,第139页。

④ 同上书,第140页。

⑤ 同上。

收回去,统治地位就会丧失。“敬德”的目的是要做到“保民”,即要体察民情,要“知稼穡之艰难”^①,要给百姓带来恩惠,而不要贪图安逸与享乐。《尚书》中周公所讲的“德”是天子、贵族的“专利”,只有他们才具有高贵的品质,一般民众是谈不上有“德”的,这是统治阶级道德优越感的表现。但是,“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思想构成了西周社会和谐的政治伦理,是其长治久安的思想基础。

第二,周公制礼作乐为西周追求社会和谐提供了制度保证。西周自从周公开始制礼作乐,用近百年时间建立起了一整套非常周全的礼制,以全面规范人们的社会关系与社会活动,并用乐制与之相配合。礼制是典章制度的总汇,是“文武周公所以治天下之精义大法”^②,分为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等,其规范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如祭祀、饮食、用兵、朝聘、婚丧,等等,人们的各种活动都要遵循和符合其等级身份的礼节仪式。《礼记·曲礼》中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礼制所遵循的原则就是强调血缘宗族关系的“亲亲”与强调上下等级秩序的“尊尊”,礼制的意义就在于约束、规范、引导和教育,以形成不同等级之间的和谐秩序,“纳上下于道德,而后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③西周的礼制中渗透着浓厚而深刻的和谐追求,官员要将和谐作为终极的追求,如太宰要和邦国、谐万民,大司徒以礼乐教化万民和谐、化解矛盾。在注重礼制的同时,西周统治者自觉地将礼与乐结合起来,以歌舞曲调等艺术形式赋予严格的礼制以审美化和情感化的内涵,以此作为实现理想社会秩序的重要途径,正如《礼记·乐记》所说:“礼节民心,乐和民心,政以平之,刑以齐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④虽然礼乐制度只是在贵族阶层内部实行,即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⑤,但是,从社会治理的角度上讲,它毕竟为实现西周社会的

① 陈戌国校注:《尚书》,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51页。

② 洪治纲主编:《王国维经典文存》,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页。

③ 同上书,第170页。

④ 陈戌国点校:《周礼·仪礼·礼记》,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425页。

⑤ 同上书,第286页。

和谐稳定提供了制度与文化保证。

第三,史伯的“和同论”开启了对和谐秩序的哲学探索。西周末年,史伯在与郑桓公的对话中提出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这是中国思想史上对和谐问题进行深入哲学探索的开始。据《国语·郑语》记载,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同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肢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书经入,行孩极。故五者居必九割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有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性,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①史伯所讲的“和”,是“以他平他”,是不同事物互相配合而达到的平衡状态,是事物存在的根据与发展的动力,只有在“和”的状态下才能产生新的事物;“同”则是排除了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同一,如果“以同裨同”,相同事物叠加的状态持续下去,缺乏差异性要素的介入,就会窒息事物的生机,结果将是事物的灭亡。史伯认为,远古帝王之所以能够成就“天地之功”,正是因为把握了和合之道,他说:“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万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者也。”^②史伯以其和同论来分析他所处的西周社会的现实政治生活,指出周王朝之所以将要衰败,正是因为周幽王“去和而取同”,排斥直言进谏的正人,而一味地相信与自己苟同的小人。

三、中华传统和谐文化理念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形成

春秋战国正处于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变革、大转折的时期,礼乐制度走向衰落,各路诸侯群雄争霸,诸子百家争鸣不已,由此造就了中华文化史上一个大繁荣、大发展的时代。中华和谐文化理念正是在儒家、道家、墨家、阴阳家等学派的精心营造下形成并日益丰富起来的。

作为对西周时期史伯与春秋时期晏子的“和同论”的继承和发展,孔子的

① 《国语·战国策》,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148~149页。

② 同上书,第148页。

“和而不同”思想可以视为儒家和谐论的核心主张。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①即君子能够与人和谐相处，而不强求同一；小人表面同一，却达不到和谐。从哲学的意义上讲，“和而不同”不是在无原则地求“和”，更不是在无差别地求“同”，不是将自身的文化标准“定于一尊”，让其他文化完全同化于其中，而是在承认差异、尊重差异的基础上求得和谐。孔子的“和而不同”的关注点、落脚点是人与人的和谐，它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为理想的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和”是以“不同”作为前提的，因为在矛盾关系之中，差异性是绝对存在的，一个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都是有差异的，一个人与其他人之间也都是不一样的，要处理好、协调好各种矛盾关系，就必须尊重差异，承认事物和人的多样性，以广阔的胸襟、宽容的情怀去接纳不同的对象，去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而不同”，首先要求每一个人都要拥有仁爱之心，真心地去关爱他人。孔子思想中的“仁”就是要求人们富于爱心，尽力帮助他人，要“成人之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不同等级之间和谐相处的“天下归仁”的理想社会，即一方面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严格的等级秩序；另一方面是“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温情关爱。

与儒家和谐论的社会取向与进取精神不同，以老子为主要代表的道家和谐论则表现出鲜明的自然取向与无为姿态。在老子那里，最高的和谐境界是“自然”，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②为求得人的内在和谐，他将“无为”、“不争”、“守弱”作为其人生处世之道，主张“圣人处无为之事”^③，“无为而无不为”^④，“不争而善胜”^⑤，“柔弱胜刚强”^⑥。老子主张节制人的欲望，“去甚，去奢，去泰”^⑦，要“见素抱朴，少私寡欲”^⑧，回归到天真纯粹、无知无欲的

①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41 页。

② 陈鼓应译：《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169 页。

③ 同上书，第 80 页。

④ 同上书，第 250 页。

⑤ 同上书，第 326 页。

⑥ 同上书，第 207 页。

⑦ 同上书，第 188 页。

⑧ 同上书，第 147 页。

“赤子”状态。他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①；反之，如果一个人欲望过多，就会导致祸害与过错，“祸莫大于不足知，咎莫大于欲得”^②。与此相适应，老子关于社会和谐主张主要包括如下内容：一是要求统治者降低剥削程度，减轻民众赋税，改变当时社会贫富分化的状况，遏制“损不足以奉有余”^③的局面，达到“损有余而补不足”^④。老子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⑤二是慎用刑罚，不能随意用死刑来威逼、镇压百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⑥三是老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虽有甲兵，无所陈之”^⑦，“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风俗淳美、和平安宁的“小国寡民”社会^⑧。

面对“国家昏乱”、“国家贫”、“国家恣音湛湎”、“国家淫僻无礼”、“国家务夺侵袭”等不和谐的现实，墨家开出了“兼爱”、“非攻”与“节用”等促进社会和谐的药方。第一，与儒家强调的“爱有差等”不同，墨家主张“兼相爱”，即平等地爱所有的人，认为这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⑨实现“兼相爱”的途径是“交相利”，即互助互利，“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⑩第二，为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和谐，墨家提出“非攻”主张，反对一切侵略战争，因为侵略战争是天下所有“亏人”行为中最为严重、最不合乎道义的举动。墨子及其门徒还身体力行其“非攻”思想，以其侠义精神和实际行动将战争冲突遏止在萌芽状态。第三，墨家倡导“节用”、“节葬”、“用财不费”、“国家去其无用之费”，反对奢靡之风，以实现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平衡。

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在哲学层面上对和谐问题作了积极的探索，其观念以“阴阳消息、五行转移”为理论基础。阴阳学说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任何

① 陈鼓应译：《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41页。

② 同上书，第245页。

③ 同上书，第336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书，第330页。

⑥ 同上书，第328页。

⑦ 同上书，第345页。

⑧ 同上。

⑨ 孙以楷、甄长松译：《墨子全译》，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305页。

⑩ 同上书，第288页。

事物内部都存在着阴与阳两种相反相成的力量,阴代表消极、退守、柔弱的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和现象,阳代表积极、进取、刚强的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和现象。阴与阳相互对立、互为根本、此消彼长、互相转化,阴阳交感而生宇宙万物,事物的衍生、变化是阴阳对立统一的结果。五行说认为万物皆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组成,并通过它们的相生相克来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五行学说将自然界的各种事物按其属性进行归纳,凡即具有生发、柔和特性者统属于木;具有阳热、上炎特性者统属于火;具有长养、发育特性者统属于土;具有清静、收杀特性者统属于金;具有寒冷、滋润、就下、闭藏特性者统属于水。五行既相生又相克,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运行不息,循环不已。

四、中华传统和谐文化理念的宗教形态

先秦以后中华和谐文化的发展除了儒家文化继续产生主要影响之外,还得益于道教文化与佛教文化的贡献。虽然宗教的和谐理念是虚幻的,但它作为社会和谐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在“现世”生活中却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道教是中国本土上产生的宗教,吸收了道家以及其他学派或宗教的和谐思想。道教具有非常浓厚的贵生色彩,认为人的生命是自然界中最为尊贵的,珍爱人的生命,追求身体健康、生活快乐、修道成仙和长生不死。基于对人的生命的珍爱,道教反对人与人之间的仇杀和战争,主张“好生而恶杀”,“长生者,道也;死坏者,非道也”,道教因而被视为一种天然的和平主义。同时,道教又是一种天生的自然主义,强调尊重一切自然生命存在的价值,主张天人合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类要爱护自然,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不要破坏自然,不要逆自然运行规则而行事。道教戒律规定,“不得妄上树探巢取卵”,“不得渔猎杀伤众生”,“不得为己杀伤鸟兽虫鱼”,“不得妄凿地毁山川”,“不得妄开决陂湖”,等等。在人与人关系上提倡人人平等、互助互利、共享财物,反对以智欺愚、以强凌弱、以少欺老、男尊女卑,要求人们做到“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道教追求的理想社会就是“神仙境界”、“洞天福地”,那里环境优美,蓝天白云,青山绿水,鸟语花香,和谐

安康,仙乐飘飘,其乐融融。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在中国本土文化的土壤里生根、发芽、成长、壮大,并最终成为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对中国传统社会和中华传统文化产生过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佛教文化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和谐内涵:就身心和谐而言,佛家要求人们戒除“三毒”(即贪、嗔、痴),戒除了贪婪、愤恨、愚昧,让心灵得到净化,就不会滋生出焦虑、烦躁、孤独、迷茫等不安的情绪,也不会发生各种荒诞、可恶甚至血腥之事,这样就能够调节身心,健康快乐;就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言,佛教主张众生平等,平等待人,尊敬待人,宽容待人,严守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欲、不邪见等戒律;就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而言,佛教认为人和自然相互依存,生命与环境是“一体不二”的,各种生命只有在自然中和谐地存在才能保证其自身的发展,人们应当放弃对自然贪婪的攫取,将此慈悲之心推广至一切有情众生,相信“众生平等”,做到“不杀生”,多吃素食;从作为佛教根本主张的慈悲精神中,可以引申出来一种独特的和平主义,佛教宣扬“戒杀”,第一大戒就是“戒杀”,诸多罪恶当中杀罪最重,诸种功德中不杀第一。

和谐文化理念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最高理念,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在人的价值观上就是“以和为贵”;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天人合一”;表现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就是“和而不同”;表现在家庭关系上就是“家和万事兴”;表现在政治治理上就是追求“政通人和”;表现在经营实业上就是“和气生财”;表现在民族关系上就是“和亲”、“和盟”;表现在国与国的关系上就是“协和万邦”;表现在艺术上就是追求意与象、情与景、文与质、神与形等之间的完美和谐;表现在普遍心态上就是自足、求稳、中庸、平和,知足常乐,性情温和,安居乐业;表现在传统思维方面,就是全面而非片面、整体而非局部地看待问题,注重从联系的、整体的视角来认识事物、理解世界,重视事物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在把握认识对象、处理事务的时候非常强调贯彻中庸原则,做到“执两用中”,即通过认识事物的两极来恰当地把握事物的现状,认识不能片面化,做事不能走极端。如此种种,博大精深,蔚为壮观,深刻而全面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

第二节 中华和谐文化的主要特征

中华和谐文化内涵丰富而又独具特色,呈现出如下方面的特征:大一统文化与多样化文化的有机结合;天人合一、顺应天时的文化特色;以血缘为纽带、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政治秩序的和谐;文化精神上的人本取向与人间关怀等。

一、大一统文化与多样性文化的有机结合

中国和谐文化从文化格局上呈现出大一统文化与多样性文化有机结合的特征。所谓大一统文化,就是在社会意识形态、文化精神中强调整个国家在政治的一致性、领土的完整性、文化的统摄性,追求国家高度一致的整体感。所谓多样性文化,就是文化内容的多样性与包容性,即尊重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学派等在信仰、习俗等方面的多样化的选择。在大一统文化与多样性文化的有机结合之中,大一统文化是前提,大一统包容多样性,多样性文化是基础,多样性处在大一统文化的统摄之下,使得中国文化形成一个多元一体、和谐共存的文化结构。

第一,长期保持下来的大一统的国家疆土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华和谐文化体系,深深地打上广地域、多民族的文化烙印。中华和谐文化是在中国不断扩大与巩固的疆域中,在一个以温带、亚热带为主的气候环境里逐渐孕育和形成的。中国地域宽广,从夏朝到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疆域面积不断扩大。成书于周秦之际的《禹贡》提出华夏族的疆域设想:“东渐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秦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其疆域北起河套、阴山山脉和辽河下游流域,南到广东、今天的越南东北部,西起陇山、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东至于大海。此后中国的疆域虽在不同的朝代有所盈缩,但基本趋势是不断扩大的。这样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一个相对独立、封闭的文化环境,使得中国文化独立发生,少受异质文化的冲击,保持其连贯性、完整性和自足性,形成

了“大一统”的文化心态。“天无二日，土无二王”^①，此观念被视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②，“六合同风，九州同贯”^③是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格局。中国历史上尽管分合不断，也有民族之间的战争，但是，中国的主体一直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统一的时间远远多于分裂的时间，维护统一、促进团结、忠实于国家的整体利益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

第二，中华和谐文化与中国的多样性文化有机联系，“大一统”文化是一种多样性的统一。辽阔的土地与相对优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庞大的人口和众多的民族，形成了一个多种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共同存在、相互影响、不断融合的局面。也就是说，多样性文化的存在必然会有对文化的开放性的要求，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演进的中国文化并没有走向自我封闭，而是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一种多样性统一、开放性发展的机制。中华和谐文化的内涵在对内开放、对外开放的环境中日益丰富，开放性越高，多样性也越明显。对内而言，由于中国地域博大，中国文化自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开放性、多元文化的特征，是本地域内包括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三晋文化、秦文化、楚文化等不同文化相互交流与融合的产物。中国文化的开放历程，就是中华和谐文化不断发展的历程。中国和谐文化的发展表现为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学派、不同教派等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尽管这个过程中存在矛盾与冲突，但是，注重和谐、交流与融合是其中的主流。就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而言，尽管其中不乏某学派对其他学派的贬斥、偏见，其主流仍然是“和而不同”，即承认差异，广采博纳，相互吸收。荀子继承了孔子、孟子的儒学，同时吸取法家的思想，“隆礼”而且“重法”；韩非子师承荀子，同时吸收老子的学说，成为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易传》更是汲取了儒家、道家、阴阳家的思想，既体现了儒家刚健有为、厚德载物的精神，又蕴涵着道家、阴阳家的辩证思维。就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来说，尽管不同民族之间有诸多矛盾，甚至会兵戎相见，而开放、交融是主流，通过民族迁徙、开展贸易、文化交流等，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发展。对外来说，中国自古就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交往，频繁交流，互通有

① 司马迁：《史记》，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106页。

② 班固：《汉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0页。

③ 同上书，第2076页。

无,增加了中国文化的多样化色彩。西汉张骞出使西域,翻越崇山峻岭,穿越茫茫戈壁,艰辛地开辟了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后来成了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象征。佛教自东汉由印度传入中国后,经过传入、渗透、融合,逐步生根、发芽、成长、壮大,在中国的哲学、政治、文学、音乐、绘画以至社会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成为中国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隋唐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融合更表现出了宽广、开放的格局,尤其是唐朝,其文化上的博大胸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盛唐气象”的恢弘境界,以海纳百川的气度为中国社会迎来了一个空前开放的时代。唐朝的都城长安成为当时的国际大都会,世界各地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装束的人们会聚于此,或经商牟利,或传播宗教,或友好访问,或留学取经,使长安城充满了异国情调。

二、顺应天时的文化特色

中华文明的经济背景是以农耕为主的自然经济形态,中国的农耕文明主要发祥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数千年来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与游牧文明的流动性、掠夺性不同,与工商业文明的进取性、扩张性、竞争性相比,农耕文明显示出稳定性、自足性、和平性等特征,形成了天人合一、敬畏自然、关爱自然、顺应天时等和谐观念。

天人合一观念的基本思想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认为天与人、天道与人道是相通的、一致的,人的生理活动和社会活动都应遵从自然规律。农耕文明的环境里,人对土地、气候等自然条件高度依赖,土壤肥沃、风调雨顺才能五谷丰登,只有尊重和服从自然秩序才能有更多的收获,天人合一的观念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易传》上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季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①庄子在《齐物论》中追求“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②的境界。根据上述观念,人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不能超越自然界本身的承载能力而任意破坏自然,只能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利用自然和调整自然,使自然更好地服

① 陈鼓应译注:《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69页。

② 陈鼓应译注:《庄子今注今译》(上册),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88页。